

朱鏡宙居士與中國近現代佛教

張家成

浙江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中文摘要

星雲大師《百年佛緣》第 50、51 節曾專門介紹近現代浙江籍的著名佛教居士朱鏡宙。在星雲大師看來，朱鏡宙的思想和立場屬於傳統派佛教，「雖然思想不同、看法不一，但為了佛法，我們還是殊途同歸啊！」朱鏡宙居士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有著極為廣泛的交遊，他不僅皈依虛雲老和尚，同時還與包括太虛大師、法舫法師等著名的近現代佛教改革家以及星雲大師等都有過密切往來。朱鏡宙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的貢獻，正如星雲大師所說的，主要表現為「印經廣傳佛教」、「認真弘傳佛法」。本文簡單考察了朱鏡宙學佛及弘法經歷，分析了其佛學思想及其對中國現代佛教的貢獻。透過朱鏡宙中年以後的佛教人生，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中國近現代佛教思潮發展演變的軌跡和脈絡，同時對於當代人間佛教的發展也不無啟示或借鑑意義。

關鍵字：朱鏡宙居士 中國近現代佛教 人間佛教



Zhu Jingzhou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Buddhism

Zhang Jiacheng

Associate Professor, Zhe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Philosophy

Abstract

Zhu Jingzhou, a well known Buddhist practitioner from Zhejiang Province, is specifically mentioned in the 50th and 51st chapters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Buddhist Affinities Across 100 Years*. In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opinion, Zhu Jingzhou's thinking and standpoints has originated from traditional Buddhism perspectives. However,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said, "Although we have different standpoints and understanding, but for the purpose of propagating the Dharma, we managed to come to a concurrence." Zhu Jingzhou has established wide connections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Buddhism. He has taken refuge in the Triple Gem and requested Master Xuyun as his teacher. He has also maintained close contacts with several modern Buddhism revolutionaries like Master Taixu, Venerable Fahang, and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As mentioned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Zhu Jingzhou's contribu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Buddhism mainly included printing scriptures and propagating its teachings. This paper briefly examines the experiences of Zhu Jingzhou in learning and propagating the Dharma, as well as analyzes his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wa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Buddhism. By looking at Zhu Jingzhou's life as a Buddhist from his mid-years onwards, not only can we witness the developmental and transformational trend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Buddhism, but we can als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Buddhism from here.

Keywords: Zhu Jingzhou, Contemporary Chinese Buddhism,
Humanistic Buddhism

一、前言

朱鏡宙(1889-1985)，字鐸民，晚號「雁蕩白衣」，溫州樂清人。朱鏡宙一生的經歷十分豐富，他既是著名的南洋華僑史專家，也是著名民國報人；又追隨孫中山先生及蔣介石，是辛亥革命志士，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活躍人物。朱鏡宙早年受西學思潮影響，思想上傾向於西方文化，曾是一名基督教徒，後來「出耶入佛」，成為一名虔誠的佛教徒，是現代中國佛教史上著名的佛教居士、佛學家。

朱鏡宙皈依佛門以後，由於其特殊的身分，他得以接觸和親近現代佛教史上著名的高僧大德。除其岳父章太炎之外，近現代佛教改革及復興運動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朱鏡宙幾乎都有接觸，如佛教復興的先驅、創辦金陵刻經處、支那內學院的楊仁山居士及歐陽竟無居士；宣導佛教革新，開啟了影響深遠的「人間佛教」思潮的太虛大師；以禪修工夫和復興禪宗祖庭名聞海內外的虛雲老和尚等等，甚至藏傳佛教的高僧能海上師、清定上師，朱鏡宙也曾經親近過，從而也對其佛學思想和弘法經歷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朱鏡宙是一位個性鮮明、極富特色的佛教居士。作為一名虔誠的佛教徒，同時又是一位理財專家、南洋地理學家、著名報人；曾剃度出家過，但主要以居士身分行世；佛學思想屬於傳統派，但又與太虛大師等革新人士保持著良好的友誼。考察朱鏡宙的佛教人生及其對中國現代佛教的貢獻，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中國近現代佛教思潮發展演變的軌跡和脈絡，同時對於當代人間佛教的發展也不無啟示或借鑑意義。

二、「出耶入佛」的因緣

朱鏡宙先生早年信奉基督教，50歲以後轉而信奉佛教。不過，朱鏡宙接



觸佛教還是比較早的。1924年3月，朱鏡宙與章太炎先生三女章珪(展的古字)在上海一品香飯店結婚，婚後偕赴廈門定居。章太炎是現代國學大師，對佛學十分推崇，特別是唯識學也有獨到的理解。受岳父章太炎先生影響，朱鏡宙也開始接觸佛學。

在朱鏡宙親近的出家比丘中，太虛大師是其中結識較早、對朱鏡宙思想影響也很大的一位。結識太虛大師的具體地點與時間已不可考，但至少是在1935年以前。「一九三五年，(太虛)師駐錫廬山大林寺，餘嘗以事入山，因得不時見。抗戰軍興，避地西蜀，過從益密。」(朱鏡宙〈我對於太虛大師的新認識〉)不過朱鏡宙登廬山見太虛大師的時間，在《太虛大師年譜》中記為1934年：「一九三四年七月，大師抵廬山，八月十二日記曰：八月十二日，大林寺舉行暑期講習會，到馬秀芳、李協和、王一亭、梁趙懋華、閻寶琛、蕭一山、韓立如、朱鐸民，及德人博爾士滿等。」自認識太虛大師以後，二人過從甚密，二十多年裡一直保持著友好往來。

在與太虛大師的往來中，對朱鏡宙影響最大的一件事是太虛大師贈其《金剛經》一書，從而成為其思想上「出耶入佛」的開始。幾十年的繁雜工作，使得朱鏡宙身體每況愈下，尤其是體弱失眠，久不能癒。時值1940年下半年，鑑於朱鏡宙出色的理財工作能力，國民政府財政部擬任朱鏡宙為湖南省稅務局長，同時陝西省主席蔣鼎文、重慶市長蔣志澄均力邀其出任陝西、重慶的財政局長。然朱鏡宙以健康原因，對上述新職均一一辭謝，轉而移居成都附近的安嶽縣清流鎮鄉下療養。是年底「某日，謁師於重慶長安寺，欲得《心經》以壓邪，師舉《金剛經合刊本》以贈，歸而讀之，月餘稍通利，竟致掩卷流涕。我之出耶入佛自此始，而大師實我惟一之接引菩薩也」。(朱鏡宙〈我對於太虛大師的新認識〉)

不過，據星雲大師回憶，關於朱鏡宙皈依佛教一事「又有一說，他曾在夜間走路時，看見一位女子在前面行走，起初不以為意，後來發現，她竟飄浮空中，嚇出冷汗。為此，他感到世道奇妙，對於人間『靈』的世界存有好奇，因而皈依佛教。」（〈百年佛緣 50「朱鏡宙居士 印經廣傳佛教（上）」〉）

自此，朱鏡宙轉而篤信佛教。當時，朱鏡宙所做的主要是遍訪川中名山大寺，廣泛搜求並研讀經論，與方外高人交遊。可以說，正是因太虛大師及所贈《金剛經》的因緣，朱鏡宙開始了學佛、研究佛學的人生歷程。正因此，朱鏡宙稱太虛大師為其「接引菩薩」。

朱鏡宙「出耶入佛」時已年過 50。中年以後才皈依佛門，這對朱鏡宙來說，即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性——正是底蘊深厚、源遠流長的江浙佛教文化土壤孕育了這樣一位傑出的現代佛教居士。近現代江浙佛教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家居士較多，對現代佛教所發揮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如施省之（杭州錢塘縣人，曾主持上海佛教淨業社）、王一亭（吳興人，參與主持中國濟生會及上海佛教淨業社）、朱慶瀾（字子橋，紹興人。1925 年去職後投身佛教社會慈善事業）、鍾利建（杭州人，杭州功德林經理）、南懷瑾（樂清人，朱鏡宙的同鄉）等都是浙江人，而朱鏡宙的岳父章太炎先生（杭州人）也是一位著名的佛學家。正是這一大批包括朱鏡宙在內的江浙籍的佛教居士，在近現代佛教的發展和演變歷程中擔當了護持佛教、弘法利生的重要使命，為中國現代佛教的改革和振興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皈依虛雲老和尚

在出家比丘中，朱鏡宙親近現代禪宗泰斗虛雲老和尚的時間雖然不算很長，但在朱鏡宙的佛學因緣中，親近虛雲大師的這段經歷對朱鏡宙佛學思想的理論和實踐影響卻是最大的。



1942年底正值抗戰期間，正在重建曹溪寺103歲高齡的虛雲和尚應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之請，赴陪都重慶主持祈願和平的大悲法會。這次法會為時二個月，不少在渝的名公巨卿都有出席，盛況空前，影響巨大。時在四川療養的朱鏡宙亦得以目睹虛雲老和尚的風采，於是萌生了親近虛雲老和尚的念頭。抗戰勝利後不久，朱鏡宙即東歸滬上，一度出任上海甌海銀行總經理。唯此時朱鏡宙先生出世心切，未久即辭銀行經理一職，旋即赴廣東曹溪南華寺隨侍中國近代著名禪宗高僧虛雲老和尚，以了卻當年之宿願。

在南華寺期間，朱鏡宙穿圓領衣，與南華寺僧眾一起誦經、作務、過堂茹齋，儼然一位苦行僧的模樣。而南華寺道風純正、戒律嚴謹給朱鏡宙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於是朱鏡宙在南華寺正式皈依虛雲老和尚，老和尚賜法名「寬鏡」，法號「佛顯」。

1948年春季南華寺舉行傳戒法會，於是朱鏡宙第二次到曹溪南華寺。時同行的馬、張二位居士擬在此次法會中從虛老和尚出家受具（具足戒），並且還屢屢催促朱鏡宙一同受具。但朱鏡宙考慮到自己身體羸弱，出家後若不能如法持戒，反而有辱出家僧伽之聲譽，故一直未敢剃度出家。於是，馬、張二人又催促朱鏡宙藉南華傳戒之機會受菩薩戒。對此，朱鏡宙依然遲疑不決，並對二位說道：「菩薩發心，處處為人，吾亦未遑也。」（參見〈我所知道的虛雲老和尚〉）但經不起馬、張二君的屢屢勸請，朱鏡宙勉強應允受持菩薩戒。在跪受菩薩戒的儀式上，因當時所用戒本系《梵網經》菩薩戒本，其中有數條專為比丘菩薩僧受，居士應須迴避，於是引禮師以朱鏡宙等人跪地良久，命眾起立稍事休息。然而虛雲老和尚曰：「不可。」於是只得仍舊跪地如前，直至老和尚迎請眾聖結束，開始說戒時，始命起立。時值農曆四月，嶺南氣候已是十分炎熱，朱鏡宙等受戒居士身著薄薄的夏布海青、單袴，跪在高低不平的泥地上，為時持續了約莫一小時又半（禮誦時不算在內），而且

還必須豎起腰桿，其間稍現懈怠，引禮師就要呵斥、糾正。此次受戒，朱鏡宙跪得兩旁膝蓋又酸又痛，揮汗如雨，但另一方面也讓朱鏡宙親身體驗到南華道風的純正、嚴整，讓人肅然起敬。

此次南華戒期圓滿後，虛雲老和尚又要離開南華趕赴雲門，以重建雲門宗根本道場。朱鏡宙聞說，堅決要求跟隨老和尚一同去雲門重建。當時虛雲老和尚擔心朱鏡宙身體較弱，受不了佛門之清苦，只是打算讓朱鏡宙繼續留在南華寺協助南華寺僧校事務。但朱鏡宙堅持隨同前往，於是隨虛雲老和尚居雲門三月，直至上海來電促回，始匆匆拜別虛雲老和尚。

在親近虛雲老和尚期間，南華寺道風及虛老和尚給朱鏡宙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在〈我所知道的虛雲老和尚〉一文中記錄了朱鏡宙親眼所見虛雲老和尚諸多感人事蹟：

一日晨，予與數僧，侍老和尚同去馬壩候車至詔關。將發，以臨時肩輿畀予行。遍覓老和尚不得，問之侍者，言已先行有時矣。予急乘輿前進，行至三里許，見老和尚以洋傘貫包袱，肩負而行。予急下輿，拜於道左，請老和尚登輿。答曰：「我腳力尚健，汝系病後，宜多節勞」。予曰：「老和尚徒步，弟子乘輿，天地間安有此理？」師曰：「我行腳已慣，汝不可與我比。」彼此謙讓移時，無法解決。最後，我請將包袱放在轎內，師亦不許。

予以時局急變，請老和尚同去台灣暫避。師歎曰：「台灣我去過，男女雜居，有同塵俗，我去說不好，不說又不好。」予曰：「香港何如？」師曰：「五十步與百步之間耳！」

老和尚每遇說戒時，語氣沉重，聲淚俱下，聽者莫不動容。嘗謂：



「受戒容易守戒難，如能於千百人中，得一二持戒之人，正法即可久住，佛種即可不滅。」

朱鏡宙還曾撰有〈復興古無盡庵嚴立戒法記〉文，記錄了他親眼目睹作為南華寺下院的「無盡庵」法戒規整的情形：

入客堂（亦即普通寺廟之彌勒殿），有牌云：奉雲公老人規訓，庵內住眾須要謹守清規。男眾到庵，無論大小執事及何親屬，必要兩人同來，方得招呼，違者重罰，亦不得留男眾住宿，尊重波羅提木叉，違者擯，請各敬依奉行，是幸。其後復大書八字：依戒奉行、清淨三業。

見此景此形，朱鏡宙不由得感歎道：「戒已為吾國時髦和尚所視為陳舊不堪一顧之廢物，不圖於嶺南見之。世謂佛法在南華，不其然歟！」

朱鏡宙等一行男眾在進入無盡庵後，「予等坐稍久，僅一中年尼師以茶果相饗，即便自去，無半句應酬話，此又為各地所無也」。謹守清規的無盡庵及庵內尼眾，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南華寺道風的純正和嚴整。朱鏡宙在南華寺的經歷，特別是虛雲老和尚戒行之精嚴，對朱鏡宙的佛學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

四、對於佛教改革的看法

朱鏡宙早年曾任杭州《自由報》、《民鐸報》編輯，自創《天鐘報》。在辦報時，朱鏡宙就曾謝絕浙督湯壽潛贈款，以保證報紙的言論自由和客觀公正的立場。《虛雲和尚年譜》亦記載：1947年虛雲老和尚108歲時，朱鏡宙與虛雲老和尚論禪宗問答，最後論及《金剛經》，師笑曰：「《金剛經》註釋多至數百種。」寬鏡曰：「但弟子讀經，從未讀注。」師曰：「不讀注亦好，

熟能生巧，只要科判明白，久讀而能了悟，讀之反易受其左右。」朱擔任報人卻拒絕名流的捐贈，讀佛經時卻「從未讀注」，顯然這是一個善於獨立思考者應有的態度和立場。面對如火如荼的近現代佛教改革暨新佛教運動，朱鏡宙亦始終保持其「不隨俗轉」的獨立思考的一貫作風。

中國近現代佛教改革運動中，太虛大師無疑是最著名的領袖人物。而朱鏡宙雖與太虛大師有數十年交誼，然而「在此相當漫長的歲月中，未嘗從大師聞法，但僅介紹我入中國佛學會，及為蜀版海刊募捐而已。後聞我病，特向戴季陶院長借車，接我上北碚縉雲山休養。居旬日下山，同浴溫泉，始互相珍重而別。那種慈祥而溫暖的態度，迄今十餘年，猶盤互腦海，久久不能去。」(朱鏡宙〈我對太虛大師的新認識〉)朱鏡宙與太虛大師二人亦師亦友，但在佛學思想上，太虛大師對朱的影響卻不甚明顯。相反地，朱鏡宙甚至還曾對太虛大師一些比較激進的主張提出過批評。

太虛大師晚年曾宣導「比丘參政」之說，對此朱鏡宙頗不以為然。為此，朱鏡宙曾與太虛大師書信往返商榷達六、七次之多。他曾致書大師稱：

若夫服務人群，參與政治，凡尊誨中所認為時機者，大師可從旁率，鼓勵白衣為之。比丘仍應務其所當急，此區區之意也。夫佛法不見重於今日功利之世，乃自然推演之結果。以孔孟之請求世法，尚不免於孔家店之危，何況吾徒？大師不聞今人之口號乎？「生活即鬥爭」。吾人將忍驅縈流以從事鬥爭乎？佛法者，無諍法也。有爭，即非佛法。然則將不鬥爭乎？世必仍詆吾徒為退嬰，為消極，為無益人群；當此之時，大師非以道殉人，必致進退失據，可斷言也。然則吾徒亦惟有篤信所守，不隨俗轉，同時盡心力於責任內事，靜以待時，惟貞惟一，允執厥中，為計之上，莫過於斯。我不自亡，人安能亡？歷代排佛亦數數矣，而終屹然未能有亡之



者，矧當此信仰之世哉！大師敝衣菲食，躬行節儉，和光同塵，世人共仰。鏡宙追隨有年，啟迪尤多。今此知見云云，亦得自大師之沾溉者。溽暑伏維為道珍攝。(朱鏡宙《上太虛法師書》)

朱鏡宙與大師書信往返商榷時，「當時頗有以佛門諍子自命之意」。他還曾題七絕一首以表其志：「維摩饒舌訴心聲，只恐鶴潦汨眾生；寧使熱輪頂上轉，不將佛法作人情。」另外，朱鏡宙在其自傳《夢痕記》中亦坦誠相告：

我認為歐陽竟無老居士至今仍活著的話，那末，大師比丘參政的公開發表，就要鄭重考慮了。古人謂國有諍臣則國興，家有諍子則家全。佛門何獨不然？」按：歐陽竟無居士生前曾著有〈辨方便與僧制〉一文，在「次辨明僧制」一節稱：「一、出家者應行頭陀，居蘭若也……二、出家者不應參與世事，又不應為名利親國王宰官也……三、出家者不應服官，不應與考也……四、出家參政大違佛戒，亦有礙世法也……。(載黃夏年編《歐陽竟無集》第 160-163 頁)

顯然，朱鏡宙贊成歐陽漸「出家參政大違佛戒」的觀點，反對「比丘參政」，主張佛教與政治的分離。不過，來到台灣以後，朱鏡宙在聽到印順法師關於太虛大師此說的說明，特別是「自我讀了大師致蔣主席書(全書第 9 編 668 頁)以後，深覺大師乃有所激而使然。」對太虛大師本人及其「比丘參政說」亦有新的認識。

朱鏡宙曾自詡為「思想落後的人」。後來與朱鏡宙先生有過往來的星雲大師也說：「據我觀察，朱居士屬於傳統佛教派，他認為，出家人還是該保留『苦行僧』形象，留在山中寺院自修，就是所謂的『為僧只宜山中住，人間社會不相宜。』」(〈百年佛緣 50「朱鏡宙居士 印經廣傳佛教(上)」〉)

面對當時佛教界比較激進的新思想、新潮流，特別是那些以繼承太虛大師自命的革命僧人的激進主張，朱鏡宙亦多有批評。他在〈我對於太虛大師的新認識〉中說：「大師為我惟一接引菩薩，論理實不容辭。但以目前佛教界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門觀之，他們皆以繼承大師自命，皆以前進分子自居，若我這樣思想落後的人，那有說話餘地，只有敬謝不敏了。」來台灣以後，正值星雲大師成立弘法團、學生會、文藝班、歌詠隊。為了接引年輕人進入佛門，星雲大師利用青年人對唱歌的愛好，「甚至在念佛共修結束後，也都是用一曲佛歌作為圓滿。在台北的朱鏡宙居士聽到這種情況，深不以為然，認為我敗壞佛教，對我滿懷瞋心。」（〈百年佛緣50「朱鏡宙居士 印經廣傳佛教（上）」〉）

不過在朱鏡宙看來，實際上太虛大師本人並非是一個「佛教革命論者」：

當世之人，一提到大師，無疑的皆以佛教革命者目之，我即其中之一。嘗考這種錯覺的造成，大率由於一二叫囂之徒，或主張佛理革命，或誹謗佛法僧三寶，謂須重行估價者，其悖謬之處，直類狂人夢囈！而其最後法寶，皆以大師為擋箭牌，大有「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之觀。世人不知底蘊，亦必以為這是大師的主張；遂使大師蒙不白之冤，而替這輩人受過。但由於我看了大師的一部分遺著以後，才明白大師乃是一個十足的復古者，不是革新者，更談不到革命二字。（〈我對於太虛大師的新認識〉）

朱鏡宙不承認太虛大師是「佛教革新論」者，反而將其歸於復古一系；雖然不贊成星雲大師創新形式的弘法之舉，但二人仍然保持良好的私人關係。「我與他在台北會面時，他並未對我表示不滿，我們仍客氣對待，更經常天



南地北地談話。」(〈百年佛緣 51「朱鏡宙居士 印經廣傳佛教(下)」〉)

由此可見，在近現代中國佛教「新舊」之爭中，朱的立場無疑偏於保守和復古。然而，朱鏡宙雖立場保守，但並不頑固。針對當時佛教界的存在普遍的弊端，朱鏡宙還是保持著相當清醒的認識和獨立的思考。1939年，朱鏡宙在《海潮音》雜誌第20卷第12號上發表〈與友人論改革佛教書〉一文，提出了他對於振興佛教亦即改革佛教的基本主張：

第一、吾人倘以弘揚大法自任，非先從整理經文著手不可。

第二、佛門之衰落，自由披髻(發)固為厲階，而寺院私有財產發達亦與有力焉。補偏救弊，竊謂應注意以下各事：「一、限制披髻，二、寺產推舉組織保管委員會保管之；三、每寺之組織分講道、修道二院。」

應該講，朱鏡宙的這些佛教改革的思想 and 主張，還是頗有針對性，也看到了當時佛教改革暨新舊之爭的實質問題所在。

五、創辦「台灣印經處」

作為一個護法居士，朱鏡宙不僅熱衷佛教慈善事業，而且畢生關注印經、弘法事業。創辦「台灣印經處」，就是朱鏡宙對現代中國佛教尤其是對台灣佛教的重要貢獻。

早在1939年，朱鏡宙就在《海潮音》雜誌第20卷第12號上發表〈與友人論改革佛教書〉，就關於校經一事呼籲「應從速成立全國統一刻經處(可作為永久機關)，搜求海內外善本，網羅全國學問精湛、品德兼備之士，無論居士或沙門任校刊之責，將三藏譯本統籌刊印、頒之各寺，用為定本。」

1949年夏季，朱鏡宙來到台灣之初，就到台北市郊的觀音山凌雲寺，向榮宗法師借得寮房一間棲身，並兼任中國佛教會理事，潛心研究佛法。當時他來到台北市想購佛經，結果好不容易才找到一部木版《淨土五經》，定價老台幣八萬元，並且只此一部，後來者即無書可買。由此可見，在日本殖民統治50年裡，台灣的文化出版事業受到壓抑，連帶著佛教經典也極度缺乏。此一事件激發了朱鏡宙辦印經處，使佛經廣為流通的構想。

關於朱鏡宙在台灣建印經處的經過，于凌波在〈台灣印經處始末〉一文中這樣回憶道：

他(朱鏡宙)初到台灣，識人不多，遂走商於老友李子寬居士。子寬居士歡喜讚歎，允予支持。時，大醒法師在座，稱：台灣如想像大陸那樣刻經，恐怕不容易辦到。如用活字排印，何不就叫做台灣印經處？這「台灣印經處」之名稱就由此而定。辦印經處，首先要有一個董事會。李子寬擬出了一分董事名單，聘請陳靜濤、王寬震、吳蘊齋、孫張清揚、陳慧復、李文啟，張雲鐵、趙德馥、竺明道、趙夷午、盧滇生、陳景陶等為董事。董事會開過一次會，通過了初步選印的三十種佛經目錄，印經處就算成立了。可憐這個「印經處」，一無處址，二無經費，三無辦事人員。各位董事不過是掛名隨喜，印經處的事務事實上是由鐸民一個人唱獨角戲。

朱鏡宙以台灣佛經缺乏，於是與在台的李子寬居士、大醒法師等發起成立「台灣印經處」，刻印佛教經論流通。除印佛教經書以外，朱鏡宙還與屈映光、趙恒惕、鐘伯毅等居士發起修訂《中華大藏經》。雖然當時台灣的佛教書籍一書難求，但台灣印經處卻大量供應，而且多半以贈送為主，幾乎只夠回收成本。那時的台灣印經處實際上「由鐸民一個人唱獨角戲」，印經事務由他的得力助手周春熙居士主事，每月都有多種經書出版。僅在1949年至



1952年間，共印佛經數達10萬餘冊。據星雲大師回憶：「我們在各地講經時，沒有經本根據，都會向台灣印經處請購，有的一本五毛錢，也有的一本一塊錢。所以在流通法寶方面，他和香港佛經流通處的嚴寬祐，同樣都是讓法寶重光、法音宣流的模範，可說功德無量。」

朱鏡宙晚年寓居台中正覺寺，還與佛教居士李炳南、朱斐、于凌波等創辦佛教菩提醫院，朱鏡宙捐款出力，支持頗多。朱氏所撰《五乘佛法與中國文化》、《八大人覺經述記》、《論地藏經是佛對在家弟子的遺教》、《維摩室騰語》等四部書亦由周邦道居士列入《中華大典》宗教類佛門類收錄，由中國文化學院印行出版。

可以說，朱鏡宙先生晚年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在台灣佛教弘法利生和佛學研究。台灣今日佛教文化的繁榮，與朱鏡宙先生等護法居士當年的努力和做出的貢獻是密不可分的。遺憾的是，因事過境遷，加之朱鏡宙先生一向為人低調，朱鏡宙在台灣創辦台灣印經處的經歷以及其在台灣弘法事蹟所知者甚少。

六、佛學思想及修持特色

1968年，朱鏡宙在〈論地藏經是佛對在家弟子的遺教〉一文（港版）即將付印時，他在第七章結論後面，增補了一段文字，作為總結。其最後一段文字，自認為是「大乘佛法的極則，願與在家菩薩共勉之。」茲引述此段文字如下：

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事業，不求名，不爭利；不委過，不卸責；常反省，勤懺悔；樂善好施，怨親平等；少欲知足，安貧守道；為眾生而服務，為萬世開太平；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菩薩如是，其庶幾焉。

由此可見，其佛學思想是繼承了大乘佛教的精神。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 傳章氏唯識學，好禪宗

朱鏡宙在其一生中，對他產生較大影響的是章太炎，並成為這位大學者的女婿。章太炎先生利用唯識學的三性、四分、八識諸概念，建構起他的「以唯識為宗」的「萬法唯識」思想體系，並試圖以法相唯識之學來融通莊子齊物論，闡明佛教無我平等之主張，「以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因此之故，時人認為朱鏡宙在佛學思想上受章太炎先生影響較大，「傳章氏唯識學，好禪宗」。

《虛雲和尚年譜》民國三十六年丁亥一百有八歲「編者按」謂：

南華傳戒時。有朱鏡宙居士系章太炎之婿，傳章唯識學、好禪宗，遠來謁師。朱有與師論禪宗問答之辭，附錄於後。——弟子寬鏡問：老和尚座下：修持有心得者究有幾人？師歎息曰：現在連找一個看門人竟不可得，遑言其它。南華至今丈席猶虛，即可概見。寬鏡又問：知幻即離，能所雙忘。正這麼時，是否與六祖告明上座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相契合？師曰：這是六祖勘問之語。知幻即離尚有所在，不能謂為能所俱忘也。又問：天台宗三觀之義是否與三性之義相合？師言：台宗設三觀以為用功次第，而禪宗無次第。語已，出觀源居士撰質疑一書見示。……寬鏡歸讀質疑竟而後知一切擬議皆是戲論。未證而說，開口便錯。不禁汗下，深自懺悔。憨山大師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說法之難有如是者。



虛雲和尚年譜的編者是香港岑學呂居士，岑氏認為朱鏡宙傳章太炎先生唯識學，顯然是當時人們對朱鏡宙佛學思想的一種普遍認知。不過，朱鏡宙雖然傳章氏唯識學，並好禪宗，但從朱鏡宙留下來的文字來看，其唯識學相關內容並不多見。在此，本文並不否認朱鏡宙繼承了章太炎先生的唯識學，但筆者認為，朱鏡宙佛學思想的特色似乎並不在於唯識與禪等佛學義理的研究，而是在於他對嚴持戒律基礎上的念佛及禪修的修行實踐。

（二）重視實修實證的梵行是朱鏡宙佛學思想的主要特徵

前文曾提及，在現代佛教改革運動中，朱的立場偏於保守復古。然而實際上，朱鏡宙在剛接受佛法不久也曾受當時新佛教思潮「一般時髦論者」的影響。民國 28 年（1939 年），朱鏡宙曾在《海潮音》發表文章主張「比丘學醫比丘尼學看護」，當時自覺這樣的主張應該夠進步，為此有點沾沾自喜，然而主編《海潮音》的法舫法師在文末加了幾句按語：「出家的二眾，應以佛所制的戒律為依歸，不能隨便有所主張。」讀了此語之後，朱氏頓覺慚愧無地，急向法師懺悔，並表示萬分感謝。這一事件給朱鏡宙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他念念不能忘記佛門戒律之重要性。

正是基於這種認識，雖然朱鏡宙不太認同太虛大師一系較激進的佛教改革主張，但朱鏡宙卻對太虛大師一直保持相當的尊重，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太虛大師「持戒之精嚴」。朱鏡宙在〈我對於太虛大師的新認識〉「立德」一節中追憶太虛大師說：「（太虛大師）更自謂受戒持戒，未敢自信，不僅不敢開壇傳戒，且連沙彌戒都不敢授；至多授瓔珞十善戒與瑜伽菩薩戒而已。即此一端，以見大師之亮德謙光，足以風末俗而勵來茲。並世如印光大師，生平未嘗與人傳戒。殆亦敬視律學而已。『若輕律者，定屬邪見，非真實宗匠也』」。（全書第 9 編 623 頁）

朱鏡宙進而明確主張：佛法與其他外道不同之處，只在「梵行」二字：

「三藏十二部所有戒條及教義，說來說去，目的只在建立梵行。梵行就是淨行的意思。所謂持戒，無非是幫助人們建立梵行的增上緣。梵行建立了，才能出離三界，解脫生死。這是佛弟子們的第一課題，尤其是出家二眾們所當朝夕追求的惟一目標。倘或離開了戒律，空談佛法，不知不覺地就要墮入外道邪眾之中，任憑你說得如何動聽，裝得如何像樣，卻與佛法不相干。」「我們要紀念法舫法師，就該要學法師的持戒精神。」(朱鏡宙〈以持戒精神來紀念法舫法師〉)

「梵行」就是「淨行」的意思，是指修行人的清淨之行為。朱鏡宙認為，建立梵行的第一課題、重要基礎就是嚴持戒律。朱鏡宙既以「戒律」為基礎的梵行為標準「審視」當時的佛門高僧大德；同時其本人學佛，亦十分注重在持戒基礎上的念佛、禪修。重視實修實證的梵行，構成了朱鏡宙佛學思想的一大特色。

(三)「圓融會通」為朱鏡宙佛學思想的另一特色

朱鏡宙佛學思想的另一個重要特色，在於繼承中國大乘佛教精神前提下主張融合大小乘、顯密、禪淨，乃至佛法與中國文化的圓融。

大乘法門之中，朱鏡宙非常重視念佛法門的重要性。在為香港普慧蓮社《第二屆紀念特刊》寫的〈怎樣叫做念佛？〉一文中，他說：「在佛所說的無量法藥中，念佛法門，當然也是一味上好的法藥。而在末法時期，這味法藥，更為契機契理。」那麼，如何「念佛」呢？朱鏡宙在總結經文中所說之後，將念佛分為「心念」和「口稱」二大類。但「無論心念或口稱，都以『心



一境性』為最要。所謂『心一境性』，就是你的能念之心，與所念之佛——境，必須合而為一。再明顯地說：就是能所雙忘，心境合一。」顯然，在主張念佛法門時，朱鏡宙強調淨與禪的融合。

鑒於台灣佛教界曾經出現的關於淨土大小乘問題的討論（如大醒法師曾言念佛生西是小乘），「因此，我奉勸念佛的同道們，早晚於佛前，回向往生西方時，能加入『蒙佛授記，立回娑婆，普度眾生。』一段原文。藉此堅固願力，於未來世，不忘本誓，乘願重來，更有其必要。因為我們自無始以來，生生世世，生此娑婆，一切眾生，都是我們的恩人。更有無邊的父母、兄弟、姊妹、夫婦、兒女、師長、朋友、六親眷屬，沉溺在迷妄之中，我們怎忍獨善其身而不加以援手？」（〈怎樣叫做念佛？〉）顯然，這是大乘菩薩道精神在念佛法門的表現。朱鏡宙在〈觀自在與觀世音〉一文中指出：觀音菩薩「在自利方面，稱為觀自在；在利他方面，稱為觀世音。觀自在，是表這位菩薩自利的德相，觀世音，是表這位菩薩利他的德相。」這一說法還是富有新意、比較少見的，也反應了其佛學思想在繼承中國大乘佛教的基礎上相容大小乘佛法的特色。

在眾多的佛書中，朱鏡宙對《木納記》一書情有獨鍾。他早年在成都養病期間，曾以 40 元請得一部成都佛化新聞社印行、張心若居士所撰的《木納記》（即《密勒日巴傳》）四卷，讀後極為感動。據他在 1947 年所撰的〈讀木納記之感想〉（又作〈木納記再版因緣〉）中說：

所得感想略述如下：1、證明西方極樂世界真實不虛，其莊嚴一如彌陀經所說。2、業力可怕，以木納祖師之成就，最後仍不能免一毒。但業力亦可由苦行而得消滅，以祖師之惡業，因以苦為莊嚴故，仍得現身解脫。3、弟子得師不易，師得弟子亦難，愈難則愈

可寶貴，愈寶貴始能連性命財產都不顧。4、不能斷貪愛，不能出三界。

1946年朱先生東歸上海時，衣服書籍盡付質庫，唯攜此四冊同行，以示對此書珍愛不已。這裡，又可見朱鏡宙的佛學思想，在禪淨融合、大小乘相容的同時，又相容顯密。

朱鏡宙曾撰寫《五乘佛法與中國文化》(1961年出版)一書，全書十二萬言，分六個章目：儒道思想與佛家二諦、五乘略說、五乘共法、佛儒道思想同異觀(上、下)、結論。

這是一部儒、釋、道比較研究之著作，朱鏡宙的儒道佛三教融合思想，別具一格：「說到中國文化，自然離不了儒道二家。儒重人倫，偏於有為。道主避世，偏於無為。佛法非有為，非無為。亦有為，亦無為。言有為，故與儒合。言無為，亦與道通。」(《五乘佛法與中國文化·四版自序》)在闡明佛法為中國整個社會文化重心之所繫的同時，主張儒、道、佛融合，綜論儒道佛三學於一體。

朱鏡宙還在〈佛教與家庭〉一文中指出：「如有時間將「修多羅」中所說關於家庭的一部分，彙集起來，其數量，或將不比儒家所視為聖經般的學、庸、論、孟為少。」他本人還從《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三《善生經》中摘出一些關於如何為夫婦、父子、主僕關係的文字，認為相關思想，有些在儒家學說中能找得到，但佛教的家庭觀則以平等觀等觀一切眾生，並無世俗階級偏見，存乎其間，更與「現代之精神」相契合。

朱鏡宙的佛學思想既強調梵行的重要，又表現出大乘佛教圓融的精神。可見，其佛學思想無疑是對漢傳佛教優良傳統的繼承，也是對當下社會現實認真反思的結果。



參考書目

1. 星雲大師：〈百年佛緣 50 「朱鏡宙居士 印經廣傳佛教」〉，《人間福報》，2014年1月22日。
2. 星雲大師：〈百年佛緣 50 「朱鏡宙居士 印經廣傳佛教」〉，《人間福報》，2014年2月12日。
3. 朱鏡宙：〈我所知道的虛雲老和尚〉、〈我對於太虛大師的新認識〉、〈讀木納記之感想〉（又作〈木納記再版因緣〉）、〈「五乘佛法與中國文化」四版自序〉、〈怎樣叫做念佛？〉、〈「論地藏經是佛對在家弟子的遺教」四版自序〉、〈佛教與家庭〉、〈以持戒精神來紀念法舫法師〉、〈觀自在與觀世音〉，《詠菴堂文錄》卷1，台北：樂清朱氏詠菴堂，1970年。
4. 朱鏡宙：〈上太虛法師書〉，《詠菴堂文錄》卷2，台北：樂清朱氏詠菴堂，1970年。
5. 朱鏡宙：〈與友人論改革佛教書〉，《海潮音》第20卷 / 第12期。
6. 朱鏡宙：〈復興古無盡庵廣立法戒〉，《虛雲和尚法匯續編》，河北：河北省佛協會。
7. 朱鏡宙：〈夢痕記（上下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3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
8. 于凌波：〈台灣印經處始末〉，《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
9. 岑學呂編：〈虛雲和尚年譜〉第3版，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
10. 歐陽竟無：〈方便與僧制〉，《歐陽竟無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